

中央民族大学藏台湾地区高山族文物流传过程考*

——从潘光旦致陈梦家的一封信札说起

张铭心 陈丽丽

内容摘要: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珍藏有一批清至民国年间我国台湾地区高山族文物,是研究高山族民俗文化的重要资料。然而这批文物的入藏过程却并不清楚。一封20世纪40年代末期潘光旦致陈梦家书札的发表,为揭示这一历史过程提供了契机。据之可知,这批文物系金祖同受丁惠康资助于上个世纪40年代后期在台湾访得,从台湾带到大陆,又因参加1949年10月举办的《全国少数民族文物展览会》从上海来到北京,经潘光旦、陈梦家积极争取与协调入藏清华大学文物陈列室,最后移交到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

关键词:高山族文物 清华大学 中央民族大学 陈梦家 潘光旦 丁惠康 金祖同

1980年9月12日,在全国政协文化组、国家文物局约请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座谈文物保护工作的会议上,著名文艺理论家王朝闻指出:“现在北京有的单位还保存着不少台湾高山族的文物,应当进行搜集并组织展览,这对加强同台湾同胞的联系和团结有很大作用。”^①

王朝闻所说的这批“台湾高山族文物”,现藏于中央民族大学^②民族博物

* 本文为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台湾的中华民族认同与记忆研究”(项目批准号18ZDA159)阶段性成果。

明清以来,对台湾地区的少数民族有不同的称谓(参见陈国强:《高山族名称沿革考》,《厦门大学学报》1963年第4期,第105-116页;贾益:《从“番”到高山族:名称流变与观念转移》,《兰州学刊》2020年第9期,第5-10页)。本文因所引用文献中多用“高山族”之称谓,为行文方便,亦统一采用“高山族”这一称谓。

①《新华社新闻稿》1980年第3882期,第17页。

②中央民族大学即原中央民族学院,1993年11月更名。本文将按相关事件发生时的称谓分别称呼。

馆,共有 500 余件,时代多属清至民国时期^①。根据老账记载,这批文物中包括 1952 年庄学本捐赠 88 件,1953 年清华大学移交 71 件,1954 年浙江博物馆^②移交 81 件。其内容丰富、品种多样,是研究台湾高山族风俗文化的重要资料^③。然而由于原始记录数据散乱和缺失,这批高山族文物何时、如何从台湾运到大陆,又是如何先后入藏清华大学文物陈列室和中央民族学院文物陈列室等问题一直不是很清楚。

近年,方继孝发表了数封陈梦家旧藏信札影印件^④,其中一封信是潘光旦写给陈梦家的(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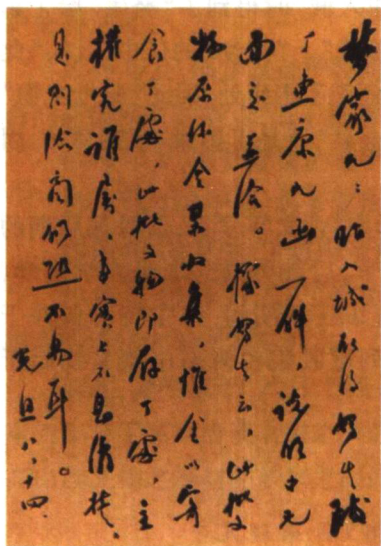


图 1 潘光旦致陈梦家的信

梦家兄:

昨入城取得努生致丁惠康兄函一件,说明由兄面交并洽。据努生云,此批文物原系金某收集,惟金以寄食丁处,此批文物即存丁处,主权究谁属,事实上不甚清楚,是则洽商仍恐不易耳。

光旦 八·十四

方先生对此信札的解说是:“潘光旦先生在陈梦家先生为协调丁惠康先生携所藏台湾高山族文物赴京参加《全国少数民族文物展览会》,赴沪与丁惠康先

- ①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登记在册的台湾地区高山族文物共 561 件,另有 9 件参考品。
- ②浙江博物馆即今浙江省博物馆。该馆原为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1953 年更名为浙江博物馆,20 世纪 70 年代更名为浙江省博物馆。详参蔡琴:《1949—1966 年浙江省博物馆事业回顾》,《东方博物》2009 年第 3 期,第 32-43 页。
- ③相关研究参见刘冠英:《台湾高山族文物介绍》,《文物》1960 年第 6 期,第 80-84 页;李丽:《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馆藏台湾少数民族文物及其价值》,《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2 年第 5 期,第 18-22 页;马莉萍:《馆藏台湾地区少数民族文物的界定与分类分级问题刍议》,《中国民族文博》第二辑,辽宁民族出版社,2007 年,第 351-365 页;杜辉:《何处寻衣——书写泰雅贝珠衣的传记》,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年。
- ④方继孝:《陈梦家往来书札谈》,《收藏家》2003 年第 5 期,第 12-18 页。潘光旦和下文提及的丁惠康信札又见于方继孝:《碎锦零笺》,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 年,第 14-15 页。

生接洽期间,写给陈梦家的信。”^①还有两封分别是丁惠康和金祖同写给陈梦家的,内容均与台湾高山族文物入藏清华大学有关。方先生对丁惠康信札的解说是:“丁惠康先生写给陈梦家先生的信。为促成丁惠康先生所藏台湾高山族文物赴京来参加《全国少数民族文物展览会》,陈梦家与丁惠康进行了多次沟通、协调,最终促成此事。”^②方先生最初认为信札的时间大概在1948年至1949年之间^③,此后进一步指出:“1949年10月,在陈梦家的积极协调下,丁惠康应北京清华大学邀请,参加《全国少数民族文物展览会》,并在会后即将高山族文物和书籍五百余种捐赠给国家,现存中央民族大学。”^④由此可知三封信札应该就是在该年举办《全国少数民族文物展览会》^⑤之前的8月和9月书写的,书写年代可以确定为1949年。

潘光旦给陈梦家的信中提到,潘光旦“昨入城”时得到了“努生”给丁惠康的一封信,信中说由兄(陈梦家)“面交并洽谈”。“努生”的信中还说,“此批文物”原来是“金某”收藏的,“金某”因寄食于丁惠康处,因此“此批文物”也就存于丁惠康处,其“主权”(所有者)是“金某”还是丁惠康,不甚清楚,因此“洽商”这件事恐怕不是很简单。

陈梦家(1911-1966)是中国现代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新月派后期的代表诗人。先后毕业于中央大学和燕京大学,后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讲学,1947年回国在清华大学执教。陈梦家在清华任教期间,曾主持筹备并于1948年4月创立文物陈列室^⑥。他为该陈列室收集台湾高山族文物始于

①方继孝:《碎锦零笺》,第14页。

②方继孝:《碎锦零笺》,第15页。

③方继孝:《陈梦家往来书札谈》,《收藏家》2003年第5期,第14页。

④方继孝:《碎锦零笺》,第16页。

⑤参见陈梦家:《清华大学少数民族文物展后感——并论大学博物馆的前途》,《人民日报》1949年12月14日第5版。

⑥清华文物陈列室创立之前,已有时任清华大学教务长的吴泽霖教授创立的民族文物陈列室,是吴泽霖在抗战胜利后,携带在贵州、云南搜集的相关文物,随清华迁校返回北京,并在清华大学内建立的。陈梦家1947年回国到清华大学任中文系教授,并兼任文物陈列室主任。相关信息散见于陈梦家:《清华大学文物陈列室成立经过》,《大公报》1948年5月1日(后收入陈梦家:《梦甲室存文》,中华书局,2006年,第262-265页);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院系漫谈》,《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4卷《解放战争时期的清华大学(1946-1948)》,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93、205页;张正明:《我所知道的吴泽霖先生》,赵培中主编:《吴泽霖执教60周年暨90寿辰纪念文集》,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第120、121页;哈正利、张福强:《吴泽霖年谱》,上海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164、169、170页。另据记载:1948年4月29日,“清华大学文物室(转下页)

1948年夏。据陈梦家记述：“1948年春天，我们知道上海丁惠康医师在（台湾）复员后，曾请人收集高山族文物，并在沪杭展览过。是年夏，奉学校之命到沪商洽收购。因收藏者不在，竟不能如愿。今年（1949）夏天我在上海与丁氏初次会面。告诉他，我们还需要借用研究他的藏品，并且这批材料公开展览，在目前有其特殊意义。丁氏了解我们的经济情形，并承推许清华的成绩，慨然先予借藏。我于九月中带回来比较重要的而较小的物品，事先整理。十月中丁氏亲自携带其余的大件北来，看到学校图书馆设置以及工作情形，就于十月十七日正式全部捐赠。”^①

根据以上材料，可列出一个时间表：

1948年春天，陈梦家获知上海丁惠康医师曾请人收集高山族文物，并在沪杭展览过；

1948年夏，陈梦家赴沪收购甲骨^②，同时奉学校之命与丁惠康洽商收购台湾高山族文物事宜，因丁惠康不在，未果；

1949年夏，陈梦家在沪与丁惠康初次见面，并洽谈借展之事；

1949年9月上旬，陈梦家从沪带回一批“比较重要的而较小的物品”；

1949年10月中，丁惠康亲自携带其余大件来京；

1949年10月17日，丁惠康将其所收集并携来北京之高山族文物全部捐献给清华大学文物陈列室。

如此，潘光旦于“八月十四日”写给陈梦家的信件，正是1949年夏陈梦家初步与丁惠康洽谈借展之事后、再次赴沪前，潘光旦为清华大学收购这批高山族文物之事与陈梦家之间的沟通信息。

二

该信札中一共出现五个人名，分别是“梦家”、“努生”、“丁惠康”、“金某”、“光旦”。其中的“梦家”、“光旦”和丁惠康自不待言，另外的“努生”、“金某”二人，则应该是罗隆基和金祖同^③。

（接上页）正式成立，冯友兰任主席。文物室地点在清华大学图书馆第二阅览室”（王涵：《王逊年谱》，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第128页）。

①陈梦家：《清华大学少数民族文物展后感——并论大学博物馆的前途》，《人民日报》1949年12月14日第5版，后收入陈梦家：《梦甲室存文》，第271-274页。

②陈梦家为《殷契拾掇》所作序言中说：“一九四八年夏天，我为清华大学文物馆到上海购买甲骨。”（郭若愚编：《殷契拾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5页）可知陈梦家这次赴沪的起因当是收购甲骨。

③方继孝：《陈梦家往来书札谈》，《收藏家》2003年第5期，第14页。

潘光旦(1899-1967),著名社会学家、民族学家。1913年就学于清华学校。1922年毕业后,赴美国达特茅斯学院留学。1926年回国,先后任职于吴淞政治大学、上海光华大学。1934年到清华大学接任教务长,并任社会学系教授、系主任。抗战胜利后,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授、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

陈梦家主持清华大学文物陈列室工作时,潘光旦是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清华大学“文物室地点在清华大学图书馆第二阅览室”^①,而且文物陈列室购置文物的资金有一部分就是原来的“购书特款移作购买古物”^②,可知潘光旦与陈梦家的工作关系很密切。方继孝认为潘光旦写给陈梦家的信是“潘光旦先生在陈梦家先生……赴沪与丁惠康接洽期间,写给陈梦家的信”^③。但据《潘光旦日记》(1949年8月13日星期六)记载:“晨雇三轮车入城……先至东厂胡同太平胡同一号同盟总部由政府拨款新屋,探住北京饭店同人已迁来未……看努生,促其函上海丁惠康兄商捐赠或贱让台湾高山族文物与清华一事,将交梦家带沪面洽。”^④前引信中所谓的“昨入城”,就是《潘光旦日记》8月13日所记“晨雇三轮车入城”一事。而《潘光旦日记》中“探住北京饭店同人已迁来未……看努生”,则说明信札中所写“得努生致丁惠康兄函一件”是潘光旦在北京饭店^⑤见到的“努生”并得其手书;“促其函上海丁惠康兄商捐赠或贱让台湾高山族文物与清华一事”,则说明信中的“努生致丁惠康兄函一件”是为了向丁惠康收购台湾高山族文物一事;“将交梦家带沪面洽”则说明这时陈梦家尚在北京还未去上海。

那么信中直称“努生”者是否可以确定为罗隆基呢?“努生”当为表字,信中直称“努生”,说明是与潘光旦关系很近且地位较高之人。与潘光旦同时代的学人中表字“努生”者,只有罗隆基(1896-1965)一人,而潘光旦与罗隆基,还有陈梦家的老师闻一多以及抗战后任清华大学教务长的吴泽霖也都是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1922年的毕业生并同年留美^⑥,同时也是朝

①王涵:《王逊年谱》,第128页。

②陈梦家:《清华大学文物陈列室成立经过》,《大公报》1948年5月30日第3版。

③方继孝:《碎锦零笺》,第14页。

④潘光旦著,潘乃穆、潘乃和编:《潘光旦日记》,群言出版社,2014年,第113页。

⑤北京饭店(北平饭店)原是英国、法国商人经营的豪华饭店,1949年到北平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各方代表人物,大部分住在这里。参见高建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纪实》,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第158页。

⑥《1911年清华学堂至1929年留美预备部时期的各类学生名录》,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4卷《解放战争时期的清华大学(1946-1948)》“补录二”,第642页。

夕相处的好朋友^①。闻一多给梁实秋的信中也见到过“努生”、“光旦”等人的名字一起出现^②,正是罗隆基和潘光旦。此外,潘光旦与罗隆基都是中国民主同盟盟员^③,《潘光旦日记》中“同盟总部由政府拨款新屋”以及“同人已迁来未”更进一步说明罗隆基等人已经到达北京^④,尚宿北京饭店,因此才有“看努生”的记述。由此判断,潘光旦信中之“努生”必为罗隆基无疑。

潘光旦请罗隆基写信给丁惠康周旋台湾高山族文物一事,说明罗隆基与丁惠康关系非同寻常。而且潘光旦信中“据努生云,此批文物原系金某收集,惟金以寄食丁处,此批文物即存丁处,主权究谁属,事实上不甚清楚”的内容,说明罗隆基对这批文物的背景也相当了解。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民主同盟总部于1947年11月被国民政府解散,罗隆基于1947年11月4日被从南京护送回上海后,软禁在上海广慈医院(教会医院)。1949年4月以前^⑤,罗隆基又被转移到了虹桥疗养院^⑥,他在这里一直到1949年5月24日脱险^⑦。这段时间,上海虹桥疗养院长正是丁惠康,他与罗隆基关系甚笃^⑧。1948年5月,丁惠康曾在南昌路法文协会

①李凌:《闻一多、潘光旦、罗隆基轶事》,《同舟共进》2008年第2期,第42-44页。哈正利、张福强:《吴泽霖年谱》,第31页。

②闻一多:《闻一多书信集》,群言出版社,2014年,第268-270页。

③罗隆基时任民盟宣传委员会主任,潘光旦任清华大学民盟支部负责人。参见薛理勇主编:《上海掌故辞典》“虹桥疗养院”条,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第366页;何学良、李疏松、[美]何思谦著:《海国学志:留美华人科学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23页。

④1949年5月31日,沈钧儒等致电请民盟主席张澜来北平主持盟务,电文被邀请名单中就有罗隆基。参见谢增寿等编:《张澜年谱》,群言出版社,2014年,第434页。罗隆基到达北平的具体时间为1949年6月24日。参见高建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纪实》,第204页;又见王海波著:《聆听岁月的脚步》,三联书店,2015年,第77页。

⑤参见谢增寿等编:《张澜年谱》,第383页。

⑥虹桥疗养院位于沪西虹桥路,是丁惠康于1934年出30余万元巨资创建的,占地10亩,是当时上海设备和条件最先进的医疗机构。参见马学新、曹均伟主编:《上海文化源流词典》“虹桥疗养院”条,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500页;又见薛理勇主编:《上海掌故辞典》“虹桥疗养院”条,第366页。

⑦参见赵锡骅:《民盟史话》,群言出版社,2014年,第475-484页;谢增寿等编:《张澜年谱》,第386页;民盟上海市委员会编:《民盟总部在沪活动纪实》,群言出版社,2012年,第68页。

⑧王孚礼:《丁惠康与虹桥疗养院》,吴汉民主编:《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第8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382-383页。

举办过“台湾高山族风俗艺术展览”^①,因此,当时在上海的罗隆基当有机会对这批文物有一些了解。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1949年8月潘光旦请罗隆基写了一封信给丁惠康,让陈梦家随身携带赴沪并当面交给丁惠康,具体商谈台湾高山族文物借展事宜。

关于陈梦家1948年和1949年赴沪与丁惠康洽商之事,《潘光旦日记》中也有所涉及。潘光旦1949年9月12日的日记中曾记录:“去岁亦曾在沪洽商及之,初拟用购让方式,因有中间人在,索价至美金五千,只有作罢。”可知1948年潘光旦曾就此事与丁惠康有过接触。潘光旦该日的日记中还记录有“(陈梦家)濒去沪前曾托其与丁惠康兄恳商,以其台湾高山族之大批文物见赠清华”^②,故推测陈梦家1948年夏赴沪之所谓“奉学校之命”,也应该是潘光旦的嘱托。进而可以认为,陈梦家于1948年和1949年赴沪与丁惠康的洽商,都是在潘光旦的指示下进行的,这进一步说明,清华大学收购丁惠康所藏台湾高山族文物之事最初是由潘光旦发起的。潘光旦曾任清华大学教务长,时任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不论其年龄、辈分还是资历,都可谓陈梦家的前辈,此事在潘光旦的主持策划下,由陈梦家具体实施是完全可能的。

三

再对信中“此批文物原系金某收集,惟金以寄食丁处,此批文物即存丁处,主权究谁属,事实上不甚清楚”的内容稍作分析。

丁惠康(1904-1979),是著名医师、学者、文物收藏家丁福保(1874-1952)之子。他于1927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1935年底获德国汉堡大学医学博士学位,主编有《中西医学报》等多种医学杂志,发起过第一届(1939年)和第二届(1940年)上海市防痨运动,著有《各国实验疗肺学》《世界各国肺结核统计》等^③。

丁惠康不但家学渊源深厚,亦如其父善理财^④。在其父的资助下,丁惠

①《台湾高山族风俗艺术展览》广告,《申报》1948年5月7日第1版。刘咸:《台湾高山族民俗展的意义》,《申报》1948年5月14日第2版。

②潘乃穆、潘乃和编:《潘光旦日记》,第122页。

③马学新、曹均伟主编:《上海文化源流词典》“丁惠康”条,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7页。

④陈存仁:《银元时代生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01-221页。何小莲:《近代上海医生生活》,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年,第290页。

康在上海设立有大西路的肺病疗养院和在沪西修建的虹桥疗养院^①。由此可知,丁氏家族当财力雄厚。丁惠康继承了其父丁福保的医学专业,也继承了其父的文物收藏爱好。在文物收藏界,丁福保被称为近代泉币收藏的泰斗,而丁惠康则因其收藏的台湾高山族民俗文物,被世人以“俗藏”称道^②。

据《申报》1948年7月30日第7版登载的《丁福保七五华诞,哲嗣捐标本为寿》可知,在丁福保七十五岁华诞时,丁惠康将他收集的一批“台湾高山族标本”捐赠给国立浙江大学人类学系。而1948年5月,丁惠康在沪上南昌路法文协会举办过《台湾高山族风俗艺术展览》,据时任暨南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刘咸教授发表在《申报》上的文章,该展览是“丁惠康医师主办,金祖同教授筹备”^③。这几条资料说明丁惠康对金祖同搜集的台湾高山族文物有主导权。金祖同也曾撰文记述道:“丁惠康博士既将所藏高山族的艺术品标本捐诸清华大学……系我在台二年搜集所得。”“当时受丁惠康氏之助,开始作全台沿铁路旅行,搜集标本。”^④“吾之搜集高山标本,全恃丁惠康博士之助力。”^⑤同时,丁惠康也曾撰文说明:“一九四六年抗战胜利台湾光复,当时有金且同(金祖同)君在台湾看到高山族文物流出在台北市上,因此鼓励他搜集研究,我则尽能力所及出资购存运回中国,在沪杭等地展览。”^⑥这些当事人的文字记载,已将这批高山族文物的所有权说得十分清楚,这批文物因丁惠康的出资购买和运输,早已决定了其主权之归属。

通过上文分析可知,丁惠康的台湾高山族文物收藏,应该就是罗隆基所谓的“原系金某收集,惟金以寄食丁处,此批文物即存丁处”的那批文物。

四

下面就金祖同搜集台湾高山族文物的情况作进一步探讨。

金祖同(1914-1955),沪上著名回族学者,祖籍浙江嘉兴。其祖父金尔珍(1840-1919)擅长书画,兼通金石,与吴昌硕、任伯年等书画名流金兰结

①刘冰:《艺医双栖——丁福保丁惠康父子》,《老沪台艺坛人物旧忆》,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43-145页。何小莲:《近代上海医生生活》,第286-287页。

②吴少华:《从海派收藏看中华元素的传承、创新与守护》,上海民族民俗民间文化博览会组委会编:《解读中华元素:上海文化论坛论文集》,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9年,第187页。

③刘咸:《台湾高山族民俗展的意义》,《申报》1948年5月14日第2版。

④金祖同:《搜集高山文物始末并述其艺术》,《光明日报》1949年10月30日第5版。

⑤金祖同:《台湾的高山族》自序,亚洲世纪社,1948年,第4页。

⑥丁惠康:《台湾高山族文物的搜集与捐赠》,《光明日报》1949年10月30日第5版。

拜,人称“少芝四弟”;其父金颂清(1878-1941)致力于经史之学,对图书文物研究有较高造诣^①。金祖同幼小受祖、父影响,少年时曾与章太炎论甲骨学^②,后留学日本,追随郭沫若学习甲骨文。有《殷契遗珠》《龟卜》《中国文字形体的演变》《甲骨文辩证》等著作^③。

抗战胜利后,金祖同应友人之约于1946年2月去了台湾^④。他最初在一个公营的商业机构任职,同时也开始关注台湾高山族文化,并积极为保存日据时期日本学者搜集到的高山族文物而努力^⑤。此后的1946年7月,金祖同被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聘为长官公署参议,后因“考古研究所任”而于12月初辞去了参议之职^⑥。1947年1月,金祖同承魏建功介绍,到台湾大学应聘为副教授^⑦。台湾“二二八事件”后,金祖同于1947年4月辞去台湾大学的教职^⑧,担任山地指导员^⑨,开始赴台湾东部高山族聚居地搜集高山族文物^⑩。

前揭《申报》1948年7月30日登载的《丁福保七五华诞,哲嗣捐标本为寿》启示中有“前年收集之台湾高山族标本”的记载,说明丁惠康在1946年就收集了一批台湾高山族文物。据夏德仪教授日记可知,1946年10月起,金祖同与夏德仪共事于国立台北大学文学院,金祖同的名字频繁出现于夏

①张翔、吴萍莉:《“昙花一现”的食旧廛》,上海鲁迅纪念馆编:《上海鲁迅研究2015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第133-137页。

②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60-965页。

③白寿彝主编:《中国回回民族史》下册“金祖同”条,中华书局,2003年,第1202-1204页。

④金祖同:《搜集高山文物始末并述其艺术》,《光明日报》1949年10月30日第5版。

⑤殷尘(即金祖同):《台湾的史前文化》,《物质文化史研究资料·中国考古》第一册,上海美术考古学社筹备工作委员会出版,1950年,第10-28页。有文章说金祖同初到台湾时曾任运通公司秘书(王鹏惠:《金祖同的台湾原住民族研究:从〈台湾的高山族〉谈起》,厦门大学“台湾原住民族群关系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国际学术研讨会”,2016年4月30日至5月2日),但不知此说何据。

⑥周婉窈:《台北帝国大学南洋史学讲座·专攻及其战后延续(1928-1960)》,《台大历史学报》2018年第61期,第62页注释152。

⑦殷尘:《台湾的史前文化》,《物质文化史研究资料·中国考古》第一册,第20页。但据夏德仪日记记载,至迟1946年10月,金祖同就已参与了台大工作(汪荣祖整理:《夏德仪教授二二八前后日记》下,台北《传记文学》2005年第86卷第3期,第33页)。

⑧汪荣祖整理:《夏德仪教授二二八前后日记》下,台北《传记文学》2005年第86卷第3期,第45页。

⑨王鹏惠:《金祖同的台湾原住民族研究:从〈台湾的高山族〉谈起》。

⑩金祖同:《搜集高山文物始末并述其艺术》,《光明日报》1949年10月30日第5版。

德仪这一时期的日记中。然而自11月以后夏德仪的日记中不见了金祖同的踪影,直到1947年1月17日“下午,金祖同兄来访,渠于十五日由沪返台也”^①,说明1946年11月以后至1947年1月15日前金祖同曾一度回到上海。这一次回上海,金祖同带回了“标本千件,照片二百帧”^②,并于12月底在位于上海南京路的大新公司举办《台湾土俗展》^③。丁惠康1946年收集到的“台湾高山族标本”,应该就是这次金祖同带回来的高山族文物。

“二二八事件”后,金祖同在台湾东部的花莲港、太鲁阁以及台北附近的淡水一带进行最后一次高山族文物的搜集工作^④,随后结束了在台湾两年的工作回到上海。金祖同这一次回到上海的具体时间尚不可考,但他在几篇相关文章中都记载他在台湾滞留两年之久^⑤,如果从1946年2月算起,到1948年1月正当两年时间。而金祖同回大陆后首次见诸文字记载的就是1948年1月参加浙江大学文理学院召开的“迎新联欢大会”^⑥。

金祖同这一次回上海后,于1948年5月5日至15日,在复兴公园南昌路法文协会和国货公司举办《台湾高山族风俗艺术展览》^⑦,这次展览“集中一千点原始艺术品”,其中除了“若干件由国立暨南大学人类学系标本室借与陈列”^⑧之外,其余应该主要是金祖同在1947年搜集的高山族文物。

五

通过以上探讨,我们对潘光旦至陈梦家信札的相关背景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1946年12月和1948年5月在上海的两次高山族文物展,引起了一直关注边疆问题的清华学人的注意,经过多次沟通协商后,最终清华大学

①汪荣祖整理:《夏德仪教授二二八前后日记》下,台北《传记文学》2005年第86卷第3期,第33页。

②《台湾土俗展 即在京沪举行》,《大公报》1946年12月13日第5版。

③《高山族风俗诡异》,《申报》1946年12月30日第5版。

④金祖同:《搜集高山文物始末并述其艺术》,《光明日报》1949年10月30日第5版。

⑤金祖同:《搜集高山文物始末并述其艺术》,《光明日报》1949年10月30日第5版。

⑥转引自杜靖:《中国体质人类学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第120-121页。

⑦据《申报》,展览地点,五月五日至十一日在复兴公园南昌路法文协会,五月十二日起转移到国货公司。

⑧刘威:《台湾高山族民俗展的意义》,《申报》1948年5月14日第2版。笔者认为,该展览借展的几件暨南大学人类学系标本,或者说暨南大学收藏的400余件台湾高山族文物,应该是金祖同于1946年底运回的那批标本的一部分。关于此问题,拟另文讨论。

如愿收藏了 200 余件金祖同搜集、丁惠康收藏的台湾高山族文物^①,并于 1949 年 11 月 4 日到 7 日,在北平国立艺专礼堂举办《国立清华大学主办台湾西南少数民族文物展览》^②。这场展览影响很大,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济深、政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乌兰夫、委员王再天、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主席谢雪红,最早研究台湾高山族文化的人类学家鸟居龙藏,以及翦伯赞、艾青、徐悲鸿等多人到场参观^③,不到四天的展期^④,观众达四千余人,京津各主要媒体皆有报道,《光明日报》特发专刊报导^⑤。展览结束后,台湾高山族文物被运回清华大学图书馆继续展出^⑥。

此后,随着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方案的实施,清华大学收藏的这批台湾高山族文物,随着潘光旦、吴泽霖、费孝通等先生赴任中央民族学院,也调拨到了中央民族学院^⑦。

据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常务副馆长杜鹏飞教授提供给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的《中央民族学院接收清华大学移交文物清册》(1953 年 5 月 16 日)可知,当时清华大学调拨给中央民族学院的文物共 66 类,合计 8329 件^⑧,其中高山族文物类共 229 件(备注中罗列了“图腾板、日用品、武器、乐器等”4 项),高山族照片 141 件^⑨,清册中对文物和照片均有定名。

如前文所言,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收藏的 500 余件台湾高山族文物

①关于丁惠康捐赠给清华大学的台湾高山族文物,曾见有陈梦家批注《丁惠康博士珍藏高山族蕃品目》一册(西泠印社拍卖有限公司 2016 年秋季拍卖会《中外名人手迹专场》第 224 号拍品),但不知该目录现流向何处。

②《国立清华大学主办台湾西南少数民族文物展览》,《光明日报》1949 年 10 月 30 日第 5 版。

③《少数民族文物昨起展览》,《人民日报》1949 年 11 月 5 日第 4 版。

④展览开始于四日下午,七日结束(陈梦家:《清华大学少数民族文物展后感——并论大学博物馆的前途》,《人民日报》1949 年 12 月 14 日第 5 版;后收入陈梦家:《梦甲室存文》,第 271-274 页)。

⑤子仪编撰:《陈梦家年谱》下,陈思和、王德威主编:《史料与阐释》第 5 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285 页。

⑥王涵:《王逊年谱》,第 150 页。

⑦王涵:《王逊年谱》,第 192 页。

⑧上引清册标注的是 8425 件,但统计清册目录,实际共有 8329 件。另有未编目文物(备注标注为“民族及民俗物品”)2454 件。

⑨这一组数据,杜辉《何处寻衣——书写泰雅贝珠衣的传记》(第 18 页)中也有引用,其根据的是原社会人类学系所有文物移交给民族学院的清册和往来函(清华大学档案,档号 54012)。

还包括浙江博物馆转交以及庄学本先生的捐赠。

浙江博物馆所藏台湾高山族文物是丁惠康于1948年8月捐赠给该馆(时称“省立西湖博物馆”)的,捐赠总数达千余件^①。而浙江博物馆1954年转交给中央民族学院的台湾高山族文物总数现已不明,据馆藏老帐明确记录的有81件^②。

庄学本收藏的台湾高山族文物,曾经出现在1948年浙江大学人类学系举办的《台湾高山族文物展览》^③上,庄先生从未去过台湾,但他多年关心边地民族,对少数民族文物标本的搜集也多有贡献^④,同时作为出身于上海的文化名人,庄学本与丁惠康、金祖同或有交往。金祖同是著名学者闻宥在持志大学任教时的学生^⑤,而且金祖同和庄学本都是闻宥在上海筹组的考古学会的早期会员^⑥,金祖同和庄学本二人当早有交往。庄学本自1945年日本战败后就回到上海,直到他1949年11月到北京参加新中国的民族工作,这段时间一直活动于上海^⑦,因此推测庄学本收藏的台湾高山族文物很可能也得自金祖同之手。庄学本捐赠给中央民族学院的台湾高山族文物,有帐可查的有88件,但除老帐所记目录外,尚未发现其他相关记载。庄学本1949年到北京后,历任国家民委参事,民族出版社《画刊》编辑室副主任,《民族画报》编辑部副主任,1950-1952年又参加了中央访问团,分别赴西南、东北和内蒙古地区考察访问^⑧,可以说已经是国家民委系统的体制内部人员。因此

①《文化界小新闻》,《申报》1948年8月6日第4版。

②笔者曾与浙江省博物馆工艺部主任范佩玲女士在“《中国少数民族文物图谱》编纂出版工作会议”(2020年11月2日,北京国谊宾馆)分组讨论会上有过交流,得知浙江省博物馆现在还收藏有高山族文物。据此可知,中央民族大学收藏的浙江省博物馆调拨高山族文物应该只是其藏品的一部分。

③国立浙江大学日刊编辑部:《人类学系明后两日举行台湾高山族文物展览》,《国立浙江大学日刊》复刊新93号,1948年12月24日;转引自杜靖:《中国体质人类学史研究》,第140页。

④黄建鹏、庄文骏整理:《庄学本年表》,《西藏人文地理》2009年第9期,第146-147页;另见《庄学本全集》,中华书局,2009年,第759-763页。

⑤参见荣亮:《闻宥先生的早期考古学实践》,李伦新主编:《海派文化与城市创新:第八届海派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汇出版社,2010年,第297-301页。

⑥相关信息,为闻宥之孙闻红先生所告知。特此感谢!

⑦黄建鹏、庄文骏整理:《庄学本年表》,《西藏人文地理》2009年第9期,第146-147页;另见《庄学本全集》,第762页。

⑧黄建鹏、庄文骏整理:《庄学本年表》,《西藏人文地理》2009年第9期,第146-147页;另见《庄学本全集》,第762页。

他于1952年将自己收藏的台湾高山族文物捐赠给中央民族学院文物陈列室就是一件容易理解的事了。

六

金祖同于1946年和1947年搜集到的台湾高山族文物在经历了多次展览和捐赠后,基本上分散到了浙江大学、暨南大学^①、西湖博物馆(今浙江省博物馆)和清华大学等机构及庄学本个人手中。此后经过数次的调拨和再捐赠,又辗转集中到了中央民族学院、复旦大学^②、浙江省博物馆等专业机构中。特别是现藏于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的这批台湾高山族文物,虽均源自金祖同的搜集,却是经历不同路径,最后又聚集到中央民族大学的。

20世纪20年代以来^③,中国大陆地区对于高山族文物的收集和展示对于促进海峡两岸人民的互相了解,文化交流,增进民族感情,促进民族团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收藏的这批高山族文物虽然一直受到民族学、人类学乃至博物馆学界的关注,但因种种原因,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对其研究却一直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进展,大多数文物还没有公开发表。笔者希冀通过这一基础性研究让学界对这批文物的来龙去脉有更多了解,从而为进一步推进相关研究、保护、利用等工作提供学术支撑。

【作者简介】张铭心,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馆长,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敦煌吐鲁番学、出土文献学、博物馆学。陈丽丽,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南方民族史、明清契约文书、博物馆学。

①关于暨南大学收藏的高山族文物,参见刘守柔:《复旦大学博物馆藏台湾地区原住民文物来源探讨》,《文化遗产研究集刊》第7辑,第156-168页。

②复旦大学博物馆藏台湾文物的基本情况,详参萧扬:《民族文化的一朵奇葩——复旦大学藏高山族文物整理札记》,《文化遗产研究集刊》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03-315页;钟经纬:《复旦大学藏台湾少数民族文物初探》,《文化遗产研究集刊》第4辑,第268-279页;刘守柔:《复旦大学博物馆藏台湾地区原住民文物来源探讨》,《文化遗产研究集刊》第7辑,第156-168页。

③厦门大学林惠祥教授曾于1929年受中央研究院委派,深入台湾山区调查高山族并采集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文物,著有《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专刊,第三号,193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影印再版)。这应该是中国大陆学者首次对台湾高山族的考察。